

美学 与文化论集

王德胜◎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美学 与文化论集

王德胜◎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与文化论集/王德胜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656-0684-7

I. ①美… II. ①王… III. ①美学—文集 IV. ①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2385 号

MEIXUE YU WENHUA LUNJI

美学与文化论集

王德胜 著

责任编辑 马 岩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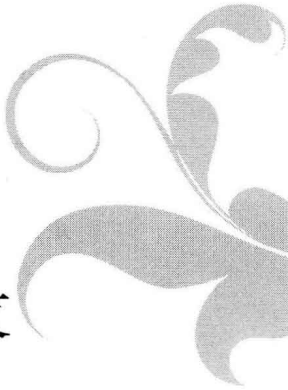
印 张 37.5 插页 1

字 数 628 千

定 价 112.00 元(精装)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录

美学的改变 / 1

——从“感性”问题变异看文化研究对中国美学的意义

“去”之三昧：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意识 / 5

回归感性意义 / 10

——日常生活美学论纲之一

视像与快感 / 20

——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

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 / 26

——答鲁枢元教授

陈述“感性”与美学话语社会化 / 35

美学如何可能走向大众生活 / 39

当代中国美学面临的挑战 / 42

当代中国美学的三个难点 / 44

新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二题 / 49

意识形态话语与理论原创性 / 57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建构问题二议

关于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两点认识 / 65	
文艺美学：问题与希望 / 71	
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 / 74	
文艺美学：“双重变革”与“集体转向” / 91	
试论艺术审美的价值限度 / 96	
走向大众对话时代的艺术 / 108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视野中的艺术话题	
大众传播与当代艺术状况 / 124	
——当代艺术模式转换的一种现实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与“美学定位” / 137	
审美文化批评与美学话语转型 / 141	
坚守理性阵地与大众对话趋向 / 147	
“审美化文化”：经济社会的人文建构 / 151	
审美文化的当代性问题 / 157	
批评的观念：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主导性意识 / 168	
批评的诞生 / 172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合法性问题	
批评的话题 / 187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扩张与危机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批判 / 195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话题 / 199	
“真实感性”及其命运 / 208	
——当代审美文化的哲学问题之一	
幸福与“幸福的感官化” / 225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视野中的幸福问题	
“技术本体化”：意义与挑战 / 238	
——当代审美文化视野中的技术与艺术问题	
传媒权力与意识形态 / 253	
媒介变化中的大众文化 / 256	

- “娱乐神话”与传媒时代的艺术经济学 / 260
- 欲望的机器 / 265
- 当代审美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大众传播现象
- 文学研究：“后批评”时代的实践转向 / 277
- “仪式化”：大众传媒制度化时代的文学写作 / 283
- 在文学“边界”之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 / 289
- 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 / 293
- 对当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一种认识
- 当前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 303
- 娱乐化的“历史” / 313
- 审美文化视野中的当代中国“历史”电影
- 宗白华美学思想初探 / 324
- 宗白华美学思想再探 / 346
- 宗白华中西比较美学思想简论 / 361
- 宗白华研究之三
- 意境的创构与人格生命的自觉 / 370
- 宗白华美学思想核心简论
- 从“形象的直觉”到“心物统一论”美学 / 378
- 朱光潜早期美学理论及其思想之源
- 转折与蜕变 / 392
-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转变
- 朱光潜晚近美学思想评述 / 404
- 走过世纪：中国美学的过去与现在 / 419
- 关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及当前研究问题的几点思考
- 中国美学：百年进程及其学术史话题 / 437
- 美学：知识背景及其他 / 446
- 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特性的一种思考
- 现代中国美学历程 / 456
- 中国现代美学史三题

- 艺术起源理论的中国形态 / 467
- “中国美学：1900—1949”研究之一
-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探析 / 483
- 文化视野中的民族美学 / 492
- 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美学 / 501
- 美学视野中的生态问题 / 505
- “亲和”的美学 / 512
- 关于审美生态观问题的思考
- 当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审美教育 / 521
- 美育的关键在于实施 / 531
- “美育中心论”质疑 / 534
- 改造我国现有的艺术教育 / 537
- 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 / 539
-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 美学的方法与“方法意识” / 542
- 读《美学的方法》
- 为“艺术学”正名 / 545
- 艺术的“心理分析” / 547
- 读《艺术与人类心理》
- 认识宗教艺术 / 550
- 天国之美的批判 / 553
- 读两本《基督教与美学》
- 重读《美学散步》 / 556
- 采撷世界美的花朵 / 559
- 《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
- 回望朱光潜 / 561
- 读《朱光潜美学论纲》
- 兼收并蓄 卓然自成 / 564
- 《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的理论精神

一部有特色的美学史专著 / 567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简介

美育如何可能“现代” / 572

美育不仅是主义 / 575

——读宁夏版“全彩艺术史系列”

寻美的勇敢冒险 / 578

——读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

机趣横生地阐发理论 / 580

——谈《创作例话》

孤独的秉烛者 / 582

——读陈鼓应《尼采新论》

为人生而研哲学 / 584

——读《蔡元培哲学论著》

文化何以能够“选择” / 586

标举新世纪的东方思想个性 / 589

——《东方文化》的方向

后 记 / 591

美学的改变

——从“感性”问题变异看文化研究对中国美学的意义

对于当代中国美学来说，过去三十年里有两方面大的倾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审美研究”为中心的各种理论建构；二是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借力“文化研究”而获得迅速展开的审美文化批评。在这两方面倾向中，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如何确立感性自身意义”的问题。在前者，“感性”问题主要被置于审美认识系统中来把握，即如何和怎样在同人的认识理性的关系方面，发现感性活动在审美中的具体存在，进而选择和确定其在美学上的结构性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感性”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美学来说还是一个认识论话题，80年代中国美学也因此基本属于哲学内部的认识研究范式，包括当时非常流行的各种审美心理研究、审美教育研究等，大体都没有脱离审美认识系统框架。在各式各样强调“审美研究”的美学理论中，“感性”的存在价值具体体现在它与人的认识理性的对应关系上；“感性”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不能离开理性在审美认识系统中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就此来看，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以追求建构“完备”的体系化理论为目标，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它既合理地强化了美学作为哲学认识论的学理身份，又弥补了过度张扬人的认识理性的美学理论之结构性缺失，向当时的中国美学和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建构前景，实现了“拨乱反正”时期中国美学对人的审美权利的期待。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于借助“文化研究”而展开的审美文化批评活动来说，“感性”问题却超越了一般认识论层面：“感性”在这里并非一种结构性存在，也不是同认识理性处于直接对应关系中的存在；它被归于人的当下生活语境，是人在现实中的生活情感与生活动机、生活利益与生活满足的自主呈现，同时也是人的直接生活行动本身。在这个层面上，“感性”体现了与整个认

识系统的关系疏远化、与人的认识理性的关系间接化，既不再具体受制于认识理性的制度性要求，也不仅仅囿于其自身作为认识本体在审美认识系统中的既有位置，而是以一种自然存在的方式作用并显现为人的直接现实生活形态。因此，对于在文化研究系统中展开自身的审美文化批评活动来说，“感性”问题的存在论特性才是根本——尽管它的认识论性质依然不可忽视，但问题的核心已经发生转移，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如何确立感性在哲学认识论系统中的结构性身份，而是如何在感性的现实呈现中确立“感性意义”的独立形象。

这样，我们发现，在审美文化批评中，“感性”问题其实具备了两方面看似对立、实际在共同文化语境中相互关联的特性。首先，在当下生活实际中，“感性”并不构成认识系统的存在本体，而是作为当下存在现象直接呈现着，所以，在审美文化批评层面，“感性”问题同作为认识系统主导因素的认识理性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对应关系，具有相对于认识理性的间接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的认识理性的规定性来责备当下现实中人的各种感性满足和利益实现要求的非正当性，不免有些文不对题。在人的当下生活层面，感性的生活情感与意志、生活利益与满足在形式上是自足的，在内在性方面则是自然合法的。由此，在审美文化批评活动中，“感性”问题根本上体现了一种由感性与理性关系的间接性所造就的非对抗性质。感性存在的自足性并没有直接破坏理性在认识关系上的绝对性，而理性在认识系统中的权力同样也不可能自动生成为当下生活的必然性干预力量。

其次，在审美文化批评范围内，“感性”问题体现了相对于人的当下生活的直接性。“感性”问题生成于当下生活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当下生活本身，当下生活活动的存在形象通过“感性”方式获得具体呈现。就像手机的使用功能离不开手机的品牌形象价值及其不断翻新的外部造型，人的各种当下生活动机、利益也同样呈现于生活本身的实现形态之上；当下生活的存在意义，决定于它所能获得的感性呈现方式、所能实现的感性呈现结果。这样，在人的当下生活动机、利益与其满足实现之间，便基本上不存在认识上的中介环节，可以直接通过生活的感性存在形象得到有意识的确认。显然，这种相对于人的当下生活的直接性特性，一方面具体表达了当下生活本身巨大的感性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则生动再现了当下生活与“感性”问题的同质化过程，从而也决定了审美文化批评活动必须超脱一般认识论，放弃对认识理性的固有信仰与理论执著，从当下生活实践本身出发去阐释生活的感性功能，介入人的当下生活之中体会

生活满足的实践形象。

从上述方面来看“文化研究对中国美学的意义”，可以认为，人的当下生活与“感性”问题的同质化过程，实际上已经最大限度地“直观化”了人的感性实践要求和利益满足，因而对于当代中国美学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理论、方法的大面积引入和利用，其最大和最现实的意义，莫过于推动并引导美学在学理层面实现自身重大改变，即通过审美文化批评活动的确立和展开，一方面，美学把关注点从作为认识本体的“感性”意义方面，迅速而现实地转向作为当下生活存在的呈现方式与呈现结果的“感性”实践，在理论建构的指向性上突破了以往一以贯之的哲学维度，为进入新世纪中国美学在“泛美学”（而非“反美学”）领域争取到新的理论生成空间。近年中美学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活美学”、“生态美学”等的讨论，其间所折射出来的对美学认识论话题的反拨，无疑就得益于这种理论建构的指向性转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两点：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在“泛美学”领域的理论扩张，主要体现在美学话语由学理深刻性逐渐向批评的敏锐性过渡，玄虚的思想开始被广泛的指涉代替，这就大大增强了审美文化批评介入现实文化的具体能力，提升了美学话语的现实效力。第二，“泛美学”的身份不仅带来了美学话语形态的重要改变，也直接改变了美学的对象形态。审美文化批评活动不再限于以人的理想精神、心灵境界作为讨论话题，而是通过批评活动的不断展开，力图在更加宽泛的层面上把人的当下生活的现实形式当做直接对象，从而实现了美学问题由抽象领域向具体领域的转移。

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文化研究的持续深入和不断讨论，人的当下实际生活情感与意志、生活利益与满足，包括人作为感性存在本体的现实享乐权利和享乐机制，也越来越受到审美文化批评活动的高度关注。它既成为审美文化批评活动的现实立场，同时也体现了当下文化语境中美学对人的生活价值体系的重建意图。因为毫无疑问，在审美认识系统中，感性的存在价值一直是被美学怀疑和警惕的——感性存在不仅是审美认识系统的低级层次，而且是对人的纯洁的理性身份的一种极具杀伤力的威胁，所以在美学所设计的生活价值体系中，感性仅仅具有、也只能具有认识系统的构造性价值，而从未获得过真正的自足性。人作为感性存在本体的现实身份同样也被美学所拒绝。而现在，当审美文化批评活动具体涉及人在当下语境中的生活现实，“感性意义”的形象价值则开始独立于审美认识系统，成为审美文化批评活动的直接对象。对于审美文化批

评来说，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为人的当下生活建立一道对抗感性入侵的“防火墙”，而是如何在当下生活感性的现实呈现中寻求意义的传达，在当下生活的感性丰富性中“合法化”人作为感性存在本体的现实身份。这样，人的生活价值体系的重建便成了美学无法逃脱的一项现实责任。这项责任显然无法在美学认识论体系中完成，它只能借助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应对。

归结起来，由于“感性”问题由理论向实践、认识系统向生活存在本体的现实转移，文化研究的引入与展开为中国美学带来了新的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批评活动的发生、发展，明显证明了这一可能性前景的鲜活力量。它既改变了中国美学的存在格局——以“审美研究”为中心的理论建构工作的式微，同时也为更加有效地建构美学与当下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方向——在肯定的意义上完善生活的美学价值。

（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

“去”之三味：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意识

美学界所有人都不会轻易忽视过去三十年中国美学发生的改变。那些改变的重要之处，也许并不在于它们向我们提供了某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也不在于中国美学借助三十年“改革开放”而在整个人文学科中变得如何重要。实际上，过去三十年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最重要改变，是它第一次通过对整个社会文化和大众生活进程的深切体认，初步完成了有关“当代建构”的美学意识，形成了一种以“当代性”姿态挑战既有美学建构方式的开放性话语。

这里，所谓“当代建构”的美学意识的完成，主要体现为：第一，经历了以严整结构方式精心设计各类美学概念、理论和体系之后，最近三十年，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是一种日益明显的“去体系化”的美学态度，以及在这一态度之下人们所从事的各种理论工作。可以认为，以体系化方式满足理论上的“完善性”冲动，属于从鲍姆加登以来美学的普遍建构形态，它要求的是对于那种从概念到理论再到理论间关系的清晰表达与逻辑呈现。就这种“体系化美学”建构方式本身而言，重要的不是美学对外部世界的陈述能力，而是美学在自身理论内部进行“自陈述”的必要性与圆满性。因此，通过理论建构所形成的，其实是一种美学话语的“自我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不需要“证实”，但却追求“证明”，即通过理论的建构来实现理论的内部圆融，其如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这一建构方式曾经被中国美学运用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直到最近三十年里才逐渐式微，开始被“去体系化”的美学建构意识所代替。借着文化开放的机遇，中国美学学者在最近三十年里努力追随世界性学术潮流，把“去体系化”的建构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人们开始不满足于美学仅仅沿袭“体系化”的旧路子，强烈的学术趋同性追求使人们学会了从后现代理论拿来各种“去”的立场，力图

在美学建构的“去体系化”姿态中寻得与世界学术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对“体系化”建构的力不从心以至于心生倦怠，以及最近三十年里各种理论资源的迅速丰富，导致中国美学学者尝试避开艰苦而难见成效的“体系化”建构思路，把更多精力放在破除体系建构之后的“散点式”理论陈述工作之上，希望借此将美学的话语权利由“自我实现”转向更加明确的“社会/文化实现”方向，体现美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新的生存。显然，以“去体系化”为目标，三十年来中国美学不断寻求的，正是一种由内向外、由自我陈述到社会/文化陈述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体系化”美学不断走向“去体系化”之后的“泛美学”——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越来越倾向于话语权力的社会化。

第二，与以上情势相联系，在美学建构意识层面上，中国美学“去本体化”的立场同样十分突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美学学者几乎“集体性”地转向了由文化研究/批评主导的审美文化研究，并且这种转向态势迄今势头不减。如果说，追求美学的本体化建构曾是20世纪中国美学直至80年代后期始终顽强不屈的理论意志，它不仅引导中国美学学者很长一段时期里孜孜寻求美学问题的终极解决，努力完成美学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终承诺，而且这种本体化的美学建构意愿也直接制约了人们对美学和美学问题的基本认识。尽管历经数次“美学热”，中国美学仍未能在“本体化”追求中真正展现令人满意的理论前景，但人们又似乎在“本体化”建构之外无从发现中国美学的前途。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情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以市民利益为核心要素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以及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大规模进入，才使得中国美学学者有机会置身前所未有的理论重建语境，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打破预设的“本体化”美学建构立场，借助“美学话语转型”讨论而转向对文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相当引人注目：

其一，在理论诉求上，美学开始不再以寻求“终极解决之道”作为自身的现实目标，而突出强调了美学问题的现实文化依据以及美学对现实的回应能力。在自行解除了“终极思想者”身份定位之后，美学不断向着“现实问题的回应者”方面进行积极转化。这种身份定位急速转化的结果，就是近年间美学学者“学术话语权”的迅速扩大、美学问题针对性的日益明确——这一点，正同上面所说的“倾向于话语权力社会化”的美学当代建构倾向相一致。

其二，在理论话语层面，美学逐渐脱开“玄思”方式，不断寻求自身作为一

种“批评话语”的可能性。早在20世纪初，以西方近代美学作为引进、学习对象的现代中国美学，曾经在理论建构上直接承续了依照逻辑思维规律展开的抽象话语方式；理论的严密性和系统性往往直接建立在高度的抽象性和概念性基础之上，而思想的深度性同样离不开逻辑推论的完整性和严谨性。在俯视现实（包括各种具体艺术活动和现象）的思想云端时，美学始终标举着不涉功利的精神纯洁性旗帜。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界仍然牢牢坚守着这一抽象思想的阵地。尽管美学的理论玄虚性也已经开始面临各种“应用美学”的挑战和切割，但依赖概念的抽象话语仍然占据主流——从80年代出版的上百种教材性质的“美学概论”那里，其实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进入90年代，由于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推动，“玄思”的美学发生动摇。一方面，面对概念抽象和逻辑推论性质的思想“深度”遭遇到的各种质疑，人们由怀疑“深度”的可能性而怀疑纯粹抽象思想的美学建构前景，逐步转向放弃单一逻辑思维形式的精神考察活动。对各种艺术/审美现象的实际热情代替纯粹思想的方式，敏感而非推论的现象批评置换了抽象分析的权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美学作为批评活动的理论前景开始展现，“美学批评”塑造了美学新的理论形象。另一方面，作为“批评话语”的美学，更多地把视线投向以“形象”方式呈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各种文化现象本身的易变性、多变性和杂多性，决定了纯粹思想的乏力和理论抽象的空泛。美学“批评”在面对批评的对象时，不能不放弃曾经的抽象思想原则，改以具体描述方式“细读”各种现象文本，进而为美学实现自身的文化批评权力确立基本前提。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对“审美本质论/绝对论”的质疑，成为美学反思自身建构局限的具体成果。这一点，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热情呼唤“审美回归”之后，显得尤为触目。事实上，80年代“美学热”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审美本质论”的巨大胜利——以“审美论”反拨“政治论”、以审美绝对性抗拒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地位，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化“拨乱反正”、实现“正本清源”的重要举措，也是美学重建理论话语和学术本体的基本姿态，其核心在于张扬“审美”作为人类精神话语的主导权力，还原审美活动的纯洁性，捍卫人类审美的精神至上性。这一姿态体现了两方面坚定立场：一是肯定人类艺术/审美活动的超越性价值，二是肯定审美原则的精神普世性。在根本上，这两方面立场最终呈现的，其实是一种坚定的本质论立场。尤其当这种“审美本质论”美学主张彻底战胜了“政治挂帅”的美学理论之后，其本身便完成了向“绝对论”美学的理

论转移——美学是一种审美的理论并且只能是关于审美的理论，除此之外，美学便不可能成为它本身。也因此，美学研究就是一种关于审美问题的讨论，美学理论就是一种有关审美问题的理性。显然，完成了这一转移的美学，已经把“审美本质论”改造成了一种“审美绝对论”，进而也拒绝了一切“非审美”或“反审美”因素进入美学视野的可能性。就此而言，9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界发生的对“审美本质论”的质疑，显然是具有颠覆性的，因为它指向的恰恰就是“审美”的绝对性价值和仿佛无可动摇的地位：一方面，因为这种质疑，“审美”之外的种种“非审美”或“反审美”现象、因素开始被人们关注和讨论，“审美”之于美学的唯一性由此发生动摇。而动摇一旦发生，改变也就在所难免。更何况，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也以鲜活的形象动摇着人们对“纯粹审美”的美好信仰。另一方面，对“审美本质论”的质疑，不仅拒绝信仰审美原则的精神普世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倡导精神纯洁性的美学权力的怀疑。从一定意义上说，90年代以后强调“审美本质”的美学建构的式微，正反映出一种特定美学权力的解体、精神绝对性的丧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9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界向审美文化研究的转向，实际也就是一种重建理论信心、重建话语权力的努力，只不过这一努力的目标已不再是绝对化的审美价值话语，而是一种“审美相对主义”的理论趣味。可以说，“本质论”的美学时代已经过去。

第三，“去理性至上化”作为一种日益明确的理论倾向，近三十年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逐渐凸现为当代中国美学重要的建构意识。现代中国美学引入西方话语的一个主要形态，是它一直把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处理为“内容与外观”、“精神与精神显现”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感性的不可或缺性源于理性的表达需要，而不是理性的实现需要，更不是感性自身的需要。感性的位置已如当初鲍姆加登所规定的，是人的低级层次的满足需要、从属(理性)的需要。对人的感性来说，天然低微的出身只有借助天然高贵的理性，才可能被合法化并获得认可。在整个美学体系中，感性权利首先不是自主性的，而是赋予性的——依赖理性的赋予；感性的价值不是其自身所决定，而是由人的理性活动所主导。很明显，建立在这种感性与理性关系上的美学，其强烈的认识论指向已经预设了感性与理性两者的主从性、层级性。长期以来，中国美学在自身现代建构路向上所追求的，就是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层级化理论架构。至上化的理性不仅规定了人们对待感性的价值态度，也确立了美学对待自身的立场——对一切感性话语始终保持一份警惕的态度，唯恐感性的不良企图玷污了理性的名声，危

及人类精神的纯洁性。然而，这种对理性至上性的崇奉，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感性化取向，以及理性至上性话语在实际生活中的有限性，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理性与感性的关系问题，并在其中引入对感性存在合法性的思考。人们一方面相信感性话语在认识论层面仍然是有限的和不完善的，因此必须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又开始承认，仅仅依靠理性的制度性权利也是有问题的，甚至可能产生更大的危害。因为对实际生活的人来说，感性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同时是一个生存论问题。尤其在美学范围内，人的感性权利之于人的生存活动，更多体现出生存论的特性。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感性和感性活动，与人的理性权利一样具有自主的价值，并且更加生动、更加具体直接。应该说，这种对感性权利的重新认识和肯定，在否定理性至上性的天然本质之际，其实已经把美学从认识论体系引向了生存论的维度。正因此，有关“身体”问题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才有可能被讨论并成为中国美学的热点话题。质言之，“去理性至上化”既是当代中国美学的一种建构意识，也是中国美学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一种建构策略和方式，它所指向的，不仅是具体的美学理论，而且是人和人的生活价值体系。

历经三十年，中国美学在“去体系化”、“去本体化”和“去理性至上化”过程中，呈现了自身的“当代建构”意识。这一意识作为当代处境中的中国美学对自身历史的反思性批判，其中既包含了强烈的颠覆性，又体现了积极的建构意愿，因而也是一种具有重构性质的理论意识。当然，对我们来说，近三十年中国美学之“去”，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它迄今仍遗留了两方面需要我们深刻讨论的问题：其一，“当代建构意识”并不等于“当代建构”。那么，中国美学真正的“当代建构”应该是什么？第二，“去”的合法性既在于“去”的过程，更在于“去”的有效性，它意味着“去”本身仍然可能因其缺少充分理据而受到质疑。那么，“去体系化”、“去本体化”和“去理性至上化”又如何被证明是有效的？

应该说，这才是中国美学界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 年第 4 期）